

斯诺夫妇与中国工业合作化运动

陈龙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曾出现过一场遍及18个省区的工业合作化运动(简称“工合”运动)。这是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以工业生产为目标,采取合作化的方式,组织民众开展生产自救,对于克服经济困难,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时曾被誉称为“经济国防线”。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前妻海伦·斯诺曾积极倡议、发起、促成“工合”的兴办,并热情撰文,向国际社会宣传、报道“工合”的事迹和精神,以寻求国际的援助,对“工合”运动的蓬勃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斯诺夫妇首倡并积极推动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兴起。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大片国土沦丧,集中在沿海地区的我国工业遭到空前的毁灭和掠夺。到1938年,全国纱厂损失60家,占70%以上,敌占区的煤矿、铁矿、炼铁厂等都沦入敌手。国民党政府曾搞过工厂内迁,但由于它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及其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能,加之仓促被动,迁往内地的工厂很少。当时后方的工厂仅341家,机件13万吨,而其中又有三分之一部分因长途跋涉受到严重损失而失去了生产能力,这样便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失业工人和大批难民纷纷从沿海涌入内地,使内地人口突然增加。由于日寇占领了沿海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对内地实行经济封锁,要从海外获得大量物资接济愈来愈困难,造成物资相当匮乏,极为严重地影响着军民的抗战士气。因此,如何动员人力物力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提供战时的军需民用,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同时解决千百万流离失所濒于饥饿的难民就业,安定后方秩序,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斯诺夫妇等国际友人首先筹划、发起了“工合”运动。

1937年底,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都在上海,他们亲眼目睹黄浦江两岸数英里之内是一片废墟,许多只日本货船载满抢劫来的机器和废铁不断地运回本国,从战略上破坏中国的工业基地,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他们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要充分发挥中国内地的经济力量将抗战坚持下去。当斯诺夫妇和艾黎在一起商讨这方面的问题时,海伦·斯诺首先提议:“必须搞一个人民生产运动,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合起来。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①显然,海伦的意思是要在中国开展工业合作化运动,斯诺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并对从事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的建议得到了艾黎的积极赞同,于是,斯诺和艾黎拟定了开展“工合”运动的初步计划,然后斯诺又把此计划交给他的朋友《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付印出版,随即在上海各界人士中间广为散发,引起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极大兴趣。在斯诺夫妇及艾黎等人的召集下,1938年4月3日,中国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

立了,由梁士纯任该会主席,委员由上海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担任。斯诺等人及时起草了中国“工合”的发展计划,提出要建立3万个工业合作委员会,使千百万人得以过上新的生活,并使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大家认为,要在全中国范围开发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非取得国民党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不可,同时也必须保持这个组织的群众性,即一定要是一个社会团体,这样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可以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援。于是斯诺等人通过一位朋友,请求正要动身前往武汉的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爵士把“工合”计划带到武汉,转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以求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并拨给资金。6月,《每日先驱报》召斯诺去采访战事,因此斯诺又亲自来到武汉,往见卡尔爵士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通过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对“工合”运动产生兴趣和关注,并支持“工合”的兴办。在斯诺等人的奔波努力下,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终于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担任理事长,斯诺又极力推荐艾黎出任技术顾问。8月24日,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从此,“工合”运动就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没有海伦·斯诺的提议,没有斯诺的奔波发起,就没有“工合”的开始。关于这一点,斯诺曾说:“‘工业合作’正如当今在全中国数以百计的自立的工场中实现的那样,首先是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的笔名)的思想的产物。正是她首先使路易·艾黎对搞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要不是由于她的新思想的合理性,和她那始终不渝的热情的天性,这一运动就永远不会变成现实。……她在发动这个伟大运动的创造性思想方面的作用……激励了(其他人)……她自己的不屈不挠而又毫不自私的劳动和贡献,为别人作出了榜样。”^②斯诺认为他们之所以产生“工合”的想法,是从陕北已建立起来的生产、消费等小型工业合作社中受到启迪的,1936年、1937年斯诺夫妇曾先后访问过陕北。

二、斯诺夫妇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和援助中国“工合”运动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工合”运动的初步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也赢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相助。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捐款和物质援助,推动“工合”运动进一步健康发展,经宋庆龄倡议,1939年1月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这段时间斯诺暂时辞去了报社的职务来香港,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协助宋庆龄做了出色的工作。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又分别派人在马尼拉、纽约、伦敦成立“工合”推进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及“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战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募捐活动的开展。受宋庆龄的派遣,斯诺夫妇首先积极奔赴马尼拉,在那里,他们同爱国华侨和反法西斯的菲律宾人民进行了广泛的联系。通过他们的热情宣传和直接组织,1939年夏很快就成立了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工合”菲律宾推进委员会,会员主要是国际朋友和旅菲华侨,由当时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亲自担任名誉主席。该会成立之初,当即筹募捐款20多万元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业合作社。接着,斯诺夫妇又赶到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一边从事写作,一边开展宣传工作,努力向人们介绍“工合”运动的意义,此举深深激起了菲律宾友人和华侨对“工合”的热情,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海伦·斯诺曾把这个时候称为他们“播种芥菜籽”的时期。为了宣传“工合”,斯诺夫妇甚至耗尽了他们的个人积蓄,这正如斯诺所说:“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斯诺在香港获悉事变真相,立即发出专电,登刊在美国《星期

六晚邮报》上。这沉重的一击，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下令取消斯诺的记者特权。2月，斯诺被迫离开了他生活了13年的中国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撰稿以维持生计，斯诺夫妇虽然生活不安定，又远在太平洋彼岸，仍然热情关注中国的“工合”事业。为了得到美国政府对“工合”的支持，斯诺夫妇把好莱坞电影界一些知名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印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督促国民党政府重视“工合”，并由美国政府贷款5000万美元专门用于工业合作化的业务。虽然这次活动未取得成功，但在美国扩大了“工合”的影响。194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会见斯诺，斯诺利用这一机会，当面向罗斯福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的作用、现状和意义，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极大兴趣。斯诺并请求罗斯福让蒋介石把美国贷款拨2000万元给“工合”以解决“工合”的财政困难，推动“工合”事业的发展，罗斯福仔细考虑后，认为不宜直接干预蒋介石怎样使用美国给予的贷款，但他表示在给蒋介石去信时，要向蒋表明他个人对中国“工合”的强烈兴趣，并要求得到一份“工合”发展情况的报告。1944年5月26日，斯诺再次谒见了罗斯福，罗说他已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而且在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上见到蒋介石夫妇时还当面问过“工合”的发展情况。在罗斯福的干预下，一段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确实给过“工合”一些支持，这与斯诺夫妇坚持不懈地奔走呼号是有直接关系的。

作为记者和作家，斯诺夫妇更主要的是经常为美、英国家的主要报刊写稿，同时，这个时期斯诺发表了《为亚洲而战》、《方生之旅》即《我在中国的十三年》，海伦·斯诺发表了《中国的民主建设》等著作，在这些通讯报道和著作中，斯诺夫妇对中国的抗战和“工合”工作都集中作了介绍和宣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合”运动的广泛开展。据“工合”国际委员会1942年7月统计，“工合”在各地共设立7个大区一级的办事处和72个事务所，建立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千个、社员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生产数千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这样，从蒙古高原到云贵高地，从延河之滨到华北平原大半个中国的辽阔土地上就出现了一条漫长的工合线。虽然“工合”协会原来要建立3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但“工合”运动无疑有力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及时生产了大批军需民用物资，支持了长期抗战，同时它还作为日后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三、斯诺夫妇推进了“工合”运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

斯诺夫妇认为：“除了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开办‘工合’外，还应该在共产党区域开办这样的合作社。”④“工合”在发起组织之初，就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斯诺来到武汉筹划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时，他首先拜见了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博古、项英等中共领导人，向他们介绍了“工合”的精神，并同他们一起研究“工合”的性质和人事安排。周恩来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工合”必须和国民党政权配合，注意保持社会团体的面貌，“工合”的主要任务是促使蒋介石抗战，并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工合”的支持。这些意见对后来“工合”工作的开展有很大影响。

“工合”协会成立之初，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曾给了一些支持，国民党政府还同意拨款500万元作为“工合”的开办基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政府对“工合”的限制越来越多，国统区的“工合”运动处于极其艰难的状态，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也认为“工合”有逃避阶级斗争、使中国走向合作社国家的倾向。因此，对“工合”也抱怀疑态度。鉴于这种情况，斯诺于1938年写

信给毛泽东,对“工合”作了全面介绍,建议中共修改关于合作社的方针,使之与“工合”原则相一致,并随信寄去一份“工合”的组织章程。毛泽东很重视斯诺的意见,并将斯诺的建议批转给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修改各根据地原生产合作社的某些规定,全盘采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组织章程。在毛泽东的积极支持下,1939年4月,西北区延安事务所成立,这是中国“工合”在解放区设立的第一个事务所。一年时间中,延安地区就办起了新华造纸厂、桥儿沟化学厂、毛纺厂、自然科学学院、技术学校、光华农场和18个供销合作社,后来,其他解放区也办起了“工合”,到1946年全解放区共办起各种合作社达7千多个。“工合”在解放区得到迅速发展,对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持久抗战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延安的“工合”机构还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地区总分会。1939年9月下旬,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再次到延安访问,受到中共的热情欢迎。9月23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正式谈话,毛泽东高度赞扬“工合”运动:“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重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情的欢迎。”^⑤毛泽东还亲自写了宣传“工合”运动的信函,让“工合”国际委员会向海外广泛宣传,以争取较多的捐款援助。在斯诺夫妇的积极参与下,“工合”国际委员会将募集到的2000多万元资金和物资通过各种途径大部分都尽快地安全地送到最急需的抗日根据地,促进了根据地“工合”事业的发展,对于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争取经济形势好转,粉碎顽固派的封锁,起了很大的作用。

路易·艾黎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曾深情地赞扬道:“不论埃德(即斯诺)在印度、香港、菲律宾,还是在他自己的祖国美国,他都是‘工合’的旗手。……在整个战争年代,埃德对‘工合’始终给予有力的支持。”^⑥事实也正是如此,为了创办“工合”,并使它走上发展的正轨,斯诺夫妇的确做了很多工作。海伦·斯诺这样说过:“斯诺感到,帮助开办‘工合’比任何事情都值得骄傲,当然我也不例外。”她又说:“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⑦这些话足以说明两位国际友人为“工合”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人民应该永世不忘他们的功绩。

注释:

①③④⑥⑦《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4、127、81、51、81页。

②《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94页。

③《斯诺文集》I,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85页。

(本文作者 石油大学社科系 山东 257062)

更正启事

本刊今年第1期《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一文,文章的作者“叶永车”应为“叶永东”,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